

李雲漢著

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

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

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

定價 平裝新臺幣 一五〇
精裝 二〇〇 元美金 五
六 元

著作者：李 雲 漢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總經銷：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初版

秦 序

就歷史之觀點而言，西安事變這一事件，的確是一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關鍵性事件，不但值得也應當研究。但無可否認，由於這一事件發生的背景並不單純，故史料的蒐集一時難以求全，要想作全面的、精確的、透闢的研究，殊非易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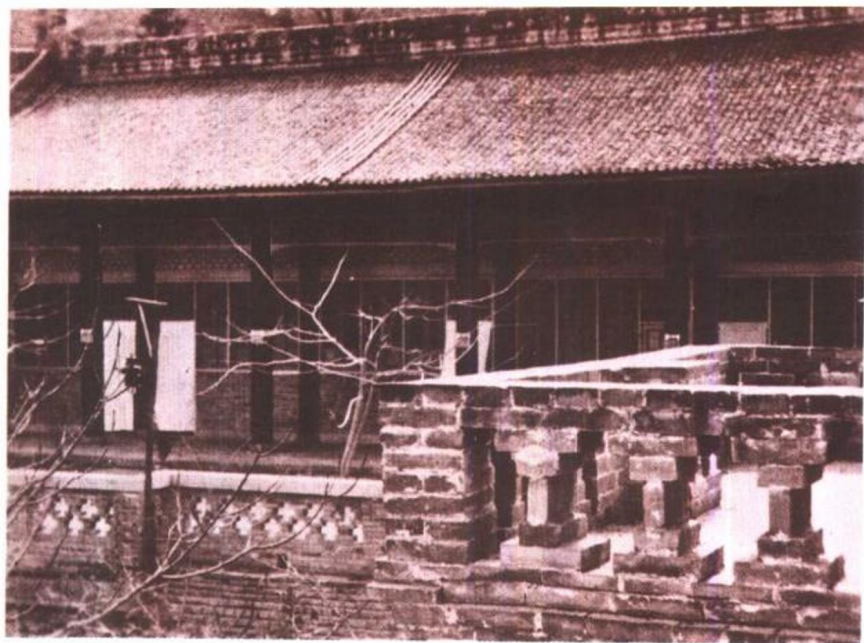
誠然，事變發生四十五年以來，已經有幾位外籍學者作過相當認真研究，也已先後出版了他們的專著。如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吳天威、長野廣生諸先生的著作，頗受到國際史學界的重視。只是，這些外文著述的一個共同點，即是中文史料的應用不够充分嚴謹；尤其是對中共方面虛偽誇張的宣傳資料，往往未加鑑定，不免流於隨手拾掇。

有關西安事變的最原始史料，多度藏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文獻機構；真正參與或瞭解事變過程的當事者，多數也定居臺北。這些原始資料以及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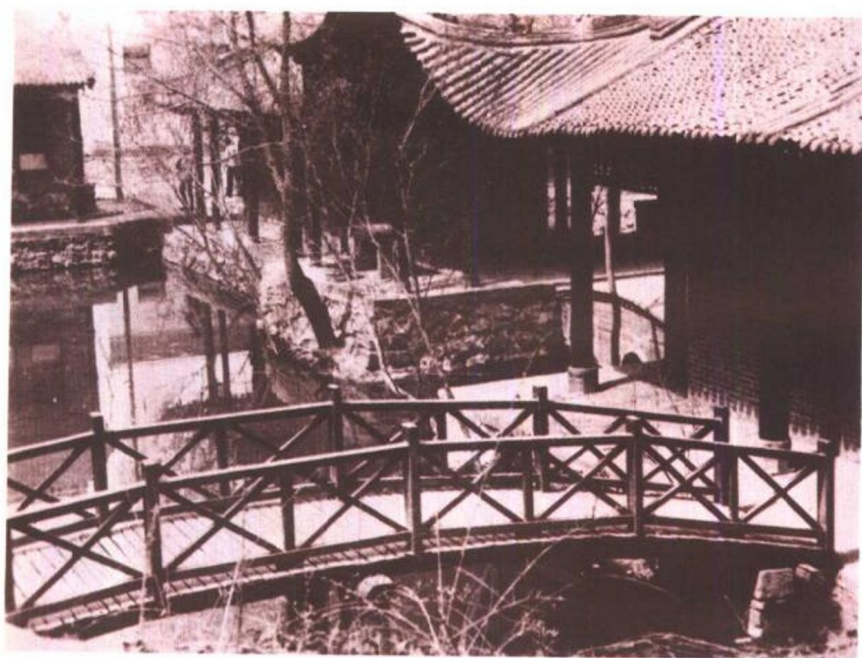
史見證者的直接陳述，應為研究西安事變所必須依據者。忽視了這些資料和人物，就會抓不緊問題核心，也扣不穩重要環節。

李雲漢教授近著「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應該是第一部應用政府檔案文件和當事人直接陳述寫成的中文學術性專著。孝儀於出版之前曾獲讀其全稿，深感這一專著除應用了最珍貴的原始史料之外，尚有兩項明顯的特點：一是對事變始末作了全面性的敘述，對國內輿論與國際反應的分析，亦極其平實；二是附帶發表了六十餘篇重要的文電和論文，充分表現出了踏實誠懇的態度。雖然這還只是著者初步研究的成果，相信對一些懸疑和虛構的說法，已足發生相當程度的辨證和澄清了。

秦 李 游



廳間五之居所池清華在長員委蔣



處之憩小欄倚時池清華節駐長員委蔣



餐共良學張與長員委蔣前變事



談交（左）城虎楊與（右）良學張



談晤（左）良學張與（右）安西在納端



迎歡場機往親席主森林京抵險脫長員委蔣



蔣委員長與西安蒙難僑胞合影



蔣委員長蒙難紀念處

7
介公鈞鑒：今日十分忙
碌，聞喚不克即來，恐
會特字聞端，納適來
留言。今日^{洛陽}天氣不好，須明
日返來，謹聞。此誌。
鈞安
學良謹肅
十月十六日
下午兩點

即列前事耳政却長何。富。電計遊約
式已預備起飛時則空軍轟炸三原又
生枝節。委座面詢于令均應候
止一切轟炸銜笑。勸望迅飭全球防
空軍遵令辦理。僑供文列未及
面陳。附日北文。

蔣鼎文致何應欽部長電報原稿（右）及說明（下）

右軍何都長誠之孫原係乃
 余西事受援王日下并卿命持
 委員長令處京省親難拍黃
 者之以德悅張至豐年百里先
 官安派係轉去長周公幸其選
 往授既主臨謂謝湯宋回東一科
 余曰賦書亦並七局里得 委於命
 移何該命至而亦無能濟謝不
 曰恭送 委於運京領候亦入
 傳令停職是已陳明 委於湯明
 展一同補見是現余寓豐年里
 星光順深湯勝前線督導以知
 前進並無微次口著某等亦十二日
 蘇州城二時三原楊軍中至某
 會雲某某也楊虎城不願和談
 有某漢某之花不依余辭院限
 楊等事做就速一二時之大限
 將赴、觀余自赴藏城諸若草
 獄中失陷路注一帶約大局得
 不確沒餘等實黃如地進北浩
 曾家趙王、得還由某可先生
 許金白兒、憲史信之神我言
 保府某余當時笑謝之歡未鮮
 手所指以市道境遠百里先出
 作古曰大達滿志五十八年著
 楊信有藉見某村原視之乃已
 某手接幅某多福運城至某生
 某名碑神駭此泥泥百里先出
 某水某成康之前機多步望云
 紹君時駐守府余見其名亦心
 平生且打板戰結束留國舞
 餘不和飲莫何人抄騎道玉
 我疾極陳化生前言所語者
 竟全斯身由似足推亮生平
 居懷微傲行某可合其貌物
 廖人旁心感 鄉新葉松告皆
 摩細所中電震雷如先生蒸子
 武強出新請見先機給密佳
 付知懷壯事以爲 顧袖衣跪
 而保甲人造運步最壯湯踏
 火因山天動易最當批活著恐
 沈保金特虎震怒
 第二二年春將歲末歲
 然之先生味着西事平與徐通又至
 百里先出觀款市中某縣總院長甚
 詳見口思其降某現對謝之局生
 有紀新迎以示觀者或改已為
 代凡其最幕中西祥子

蔣同志瀝陳至誠情詞懇切懇望在
 職昨經中央一致慰切慰望在
 案若復接續再遞辭呈情
 詞敦摯中央深知同志頻年
 為國為民負荷艱鉅身心交
 瘁異於常人前惟念深年時
 艱同志為中外所宗仰國家
 之保障際茲時艱攻礙難允
 准呈請特為中央所屬在事
 寬籌日慰望中央全國人民
 共一衷舉職事仍仍勝所有
 再行呈請一節仍應統一致決
 議慰切慰望中央並給假一月
 藉資休養
 調攝
 呈
 呈
 呈

稿原文議決長員委蔣留慰切懇次再會員委務常央中黨民國國中

前言

毫無疑問的，發生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先總統蔣中正先生認為這次事變，「實爲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爲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註一），蔣夫人則認為這是「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次革命正義之鬥爭」（註二），其他當事人及現代史學者，亦無不認定這次事變是個歷史的轉折點：中日戰爭之提前爆發及中共戰時之坐大，馴至大陸淪陷於共黨暴政之下，「推源禍始，皆肇端於西安事變」。（註三）

事變的發動者，爲張學良與楊虎城。張學良當時的職務是西北剿匪副司令兼代總司令，且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楊虎城當時則任西安綏靖主任兼第十七路軍總指揮，且爲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楊均駐節西安，中央畀以西北軍政大權，倚爲屏障，原冀其一舉殲滅甫於二十四年秋季竄抵陝北之殘餘共軍，以竟安內全功；初不意變生肘腋，發生此一親痛仇快，害己禍國之叛逆行動。難怪胡適於聞變之後，即沉痛的喊出：「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註四）

稽諸史實，西安事變的主謀者實爲張學良本人。張氏亦坦承「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

Apr 21/07

累」，「作孽者，乃良自身」，「西安之變，禍首爲誰？禍首則爲『我心』」。（註五）然則，張氏之「我心」何以能驅其貿然發動此一中外震驚之劇變？其答案乃在「我心」已爲中共以抗日救國爲號召的統戰政策所征服，墮其彀中，而不自覺，爲其利用，而不自知。

以是追索西安事變發生的因緣，首應論析中共統戰政策的來源與目的，以及在中共統戰運用下，張、楊在事變前與中共之間的秘密關係。吾人所首應指明者：中共當時喊出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目的並非爲了抗日，而是「向敵人要求生存」的一種策略，能作到「起死回生」或「絕處逢生」的一件「法寶」。蓋中共自二十三年十月被迫自贛南基地突圍逃竄後，經十一個月的艱苦跋涉，於二十四年九月抵達陝北時，實已無力再與國軍作武力之抗衡，爲求生存，不能不別謀對策。適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於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間在莫斯科召開，作成令各國共黨採行「聯合戰線」的決議，中共代表王明（陳紹禹）且以中共中央名義在莫斯科發表「八一宣言」，並派另一共黨份子張浩（林毓英）回國傳達命令，於是以毛澤東、周恩來爲首腦的中共中央爲謀解除被國軍徹底消滅的危險，作成了「十二月決議」，開始向全國各階層施展其呼籲「抗日救國」的統戰策略。（註六）

民國二十五年，是中共運用統戰策略最爲積極的一年，也是獲得極大成功的一年。由於中共有效的利用了因爲日本侵凌華北而激起之國人普遍而高漲的抗日情緒，因而極易進行其煽動與分

化工作。當時中共對外曾運用所謂「人民陣線」的策略，據中國國民黨方面所得中共機密文件，獲悉中共當局對於建立人民陣線一事，曾作如下的決議：

一、藉抗日名義，發動廣泛的人民陣線，利用作爲中國共產黨的外圍。

二、此項戰線的組織，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階級，什麼武裝隊伍，在抗日的名義下，都可參加。但以工人階級及農民爲此項組織的基本動力。

三、此項組織的路線，以根據各地羣衆的生活狀況，組織各種不同的救國團體：如工人救國會、農民救國會、商民救國會、學生救國會、婦女救國會、軍人救國會、災民救國會、文學救國會、讀書救國會等，在救國名義下，並發動反現政府的鬥爭，其組織方式，在原則上採取秘密，但在相當情形下爭求公開。

四、此項組織的領導權，由共產黨負責發動領導之，其手段以最積極的態度言論行動操縱奪取之。尤以發動一般民衆本身利益的要求，爲動員抗日的先決條件，以求領導權之鞏固。

五、此項組織的運用：（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二）反對現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三）發動民衆本身利益的要求，以戰前或戰後，障礙現政府政權的發展以至奪取政權。（註七）

自然，中共統戰的對象是多方面的：青年學生、失意政客、無格文人、以及所謂非中央系統

的雜牌軍隊等，都是彼等積極爭取的對象。中共在軍隊統戰方面，有一突出的現象，即在全力爭取張學良統率的東北部隊——國人習慣上仍稱之爲東北軍。彼等特設立了「北線白軍工作委員會」等機構，派幹練人員負責，針對東北軍心理上、訓練上若干缺點，極盡挑撥煽惑之能事。其結果不但是官兵剿共心理的轉變，而且是將領意志與決心的動搖，身任剿共主將的張學良，竟於西安事變前一年間，與共黨首領間數度秘密來往，且竟達成某種違背政府決策的協定，來要脅最高軍事統帥接納。遭到拒絕後，卽囑顧軍紀國法，悍然進行暴力劫持——這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這是中國人的不幸，更是張學良及東北軍民的悲劇，誠如張氏晚年所自省者：「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爲甚！」「坐受其利者，反爲共產黨耳。」（註八）歷史的教訓如此慘痛，治中國現代史者如何可以等閒視之？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其不能見諒於國人者，乃在其不明時勢，不通事理，不守綱紀，不顧民意。以時勢論，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以後，西南問題和平解決，全國統一局面告成，國際地位提高，統一禦侮見諸於事實——全國人民均感興奮鼓舞，授政府以最大信賴與無限期望；隴海鐵路工程車於十二月七日由西安直達寶鷄，宣告隴海路展築工作提前完成；綏遠國軍於百靈廟之捷後，再於十二月九日乘勝攻克大廟——錫拉木楞廟，正擬進軍察東，政府亦以綏遠戰爭告捷而斷然停止與日本間的談判；一切政象均足使國人額手稱慶，而外人亦正「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贊歎

」(註九)之際，忽傳張、楊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消息，這如何不令人慨嘆叛變者之無識與不智！

以言事理，張、楊在黨爲中央委員，在國爲方面大員，對中央之國策，豈所不知！張氏身任西北剿匪代總司令之職，對政府剿共之決心，豈所不知！受政府委任，且爲統帥倚重之人，私自秘密與敵對方面來往，而竟不向政府與主帥報告；對中央國策與剿共行動有所陳述而不獲接納，即行「兵諫」，其政治道德何存！其有悖事理也自明！

以言綱紀，不論其是否託名爲「兵諫」，亦不論其動機是否出於救國，只要其行動表現爲犯上作亂——武力劫持，搶掠市面，扣押高級將領，破壞鐵路橋樑，密令蘭州、洛陽等地東北系軍隊同時行動等等，即係叛國，即是犯罪。叛國犯罪，自應受國法之審判與制裁；倘仍囁嚅於所謂「政見」、「救國」等等，毋乃過度蔑視軍紀國法之尊嚴！

以言民意，則事變期間全國民衆之焦灼憂慮，沉痛悲憤，蔣委員長脫險消息傳出後之舉國騰歡，如醉如狂，均歷歷在目，誠如上海申報所論證，「一般國民對於國事關懷之殷切，與夫擁護領袖忠忱之真摯，任何方面不能予以否認者也。」(註一〇)吳佩孚稱之爲「民意的總投票」(註

一一)，大公報認作是「空前未有的奇蹟」(註一二)，而首都十萬公民組成「救國赴難團」要隨軍征陝(註一三)，北平九所大學發起萬人營救蔣委員長運動，簽名第一日即超出萬人之數(註一四)，雲南六十歲以上的耆紳二百多人，也要組團靖難(註一五)，上海利興烟草公司帳房練映川，因

憤張、楊之劫持蔣委員長而竟自殺身死（註二六），凡此種種，豈是偶然！張、楊於發動事變前，是否曾熟慮及此？

所幸張學良及時悔悟，親送蔣委員長返京並向中央自請處分，西安事變始未釀成民族的浩劫。是張學良，仍不失為血性男兒，雖經判刑，終邀赦典。楊虎城則反是，蔣委員長返京後，彼仍執迷不悟，且更與共黨共軍相結納，以達其割據西北之封建目的。以是西安擾攘叫囂，幾於引發干戈者又近一月。楊氏陝人，固以「陝人治陝」為號召者，西安事變前後所作所為，其於陝人為利為害，已不待置論；擅劃陝北為赤區一節，即已為陝人伏無盡之災與無窮之憂。

國人每滋疑議者，乃共黨於西安事變解決過程中所擔任之角色問題。誠然，西安事變乃共黨實施統戰政策所產生的成果，惟發動之前，張、楊並未與共黨計議。事變後，張、楊邀周恩來進入西安，周曾參與張、楊間的磋商，亦均屬事實。（註二七）惟事變之發動與解決，自始至終居決定性角色者，仍為張學良；而張之改變初衷，深感愧悔者，乃係由於對蔣委員長人格及抗日計畫的進一步認識，而西安善後的處置，亦係出於蔣委員長之遠見與明智。這一點，狡黠如毛澤東者，亦未曾否認，毛於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告知美籍共黨作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舉，如果不依照蔣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後辦法，則和平